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学者文库◎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青年学术文集

郑成宏/编

ZHONGGUO SHEHUI KEXUE ZAZHISHE
QINGNIAN XUESHU WENJI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学者文库◎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青年学术文集

郑成宏/编

ZHONGGUO SHEHUI KEXUE ZAZHISHE
QINGNIAN XUESHU WENJI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青年学术文集/郑成宏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7

ISBN 978 - 7 - 5004 - 9636 - 6

I. ①中… II. ①郑…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44601 号

责任编辑 张林 孙晓晗

责任校对 郭娟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9.75

字 数 499 千字

定 价 6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学者文库》 编辑委员会

主任 高 翔

副主任 王利民 余新华

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利民 王兆胜 孙 魏 李红岩 余新华

范勇鹏 柯锦华 姚玉民 祝晓风 高 翔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学者文库》序

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建社三十周年，《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1月创刊）迎来创刊三十周年、《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7月1日创刊）创刊一周年的特殊日子里，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诸同仁精选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汇集成这套《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学者文库》出版了。这是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科研人员呈现给自己单位的一份深情厚礼。

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始终坚持“编研结合”的方针，要求编辑人员结合自己的编辑工作，认真研究理论和学术问题，既要密切跟踪国内外学术前沿，又要准确把握本学科的学术历史；既要关注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又要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努力形成自己的研究理念、研究风格和独到见解。正是浓厚的学术氛围、严谨的学术风气、深厚的学术积淀，使杂志社不同于一般的编辑机构，它拥有一支具有较深理论造诣和学术积累的科研队伍，推出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研究成果。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主办的学术报刊，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学术水平，在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洪流中，占有醒目而且重要的位置。

最近几年，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的关心和领导下，进一步加强了对理论学术前沿的研究和引领，率先在全国期刊界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编辑室，建立了理论前沿研究中心，创办了《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创办了新中国第一份全国性哲学社会科学专业报纸《中国社会科学报》，完善采、编、发流程管理，大力实施“开门办刊”和“开门办报”方针，更加强调“编研一体化”，努力培养和造就一大批专家型编辑、记者，努力为推动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当代学术话语体系作出更大贡献。这套学术文库，可以说是对杂志社编研结合办社方针成果的一次检阅。

尽管这部学术文库所收论著，既有离退休老同志的论文辑录，也有在职同志的自选集，还有青年同志的学术专论，但毕竟只是部分同仁的科研成果，未必代表杂志社工作人员的最高学术水平。当然，从其所涉领域、研究理路、学术风格中，人们能或多或少地体会到杂志社独特的学术视野和科研特色。

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是一项充满挑战、异常艰辛的工作。在这里，没有坚定的信念，没有坚强的意志，没有经受挫折、百折不回的精神，是不可能做出任何重要成绩的。好在中国学术，具有源远流长的优秀学术传统，无论是从事编辑工作，还是从事科研工作，只要认真反思、体会、继承这些优秀传统，就能够获得一些重要的教益。

一是求是的传统，也就是追求真理、探索规律的传统。真正的学问家，从来都将认识人类之命运作为自己全部学术活动的出发点，力图通过对社会关系、社会形态的反思，通过对人和自然关系的反思，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结论，即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事实上，高层次的学术活动，不但是严谨的，而且是思辨性的，充满了理性的睿智。

二是求真的传统。学术研究，就其直接目的而言，就是揭示和研究人类活动的各种形态。这决定了它必须将具体的事实在作为自己学术立论的重要基础。明儒王阳明曾提出“五经亦史”的重要论断，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其言未必准确，但反映了中国学术注重事实、不空言义理的重要传统。学术的科学性，首先取决于研究者是不是在依靠事实说话。事实的论证，要永远重于空洞的说教。

三是经世的传统。这就是主张学术研究要服务国家，服务民族，做到文须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经世不但是研究目的，而且是一种道德，一种精神，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位卑未敢忘忧国”，以学问回报社会的高尚情操和庄严责任感。在中国传统社会，学术从来都以经世为其基本目的。章学诚在《浙东学术》一文中，明确阐述了自己以史经世的学术主张：“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这就是说，注意人伦日用，关注时代需要，是章学诚治史的重要特征，也

是其以史经世的基本内容。正是经世的传统使史学在中国历代社会与政治变革中发挥着独特的重要作用。

环顾当今学林，中学与西学互动，传统与现代并存。然而，我们民族悠久、深远的优秀学术传统，仍是我们前进的基础和出发点，是不可或缺的智慧宝库。学术研究如果不以求是为目的，如果不关注、不探索社会演变的规律，以繁琐考证取代理论思维，以堆砌资料为博，以叠床架屋为精，拾芝麻以为玑珠，袭陈言而自诩多闻，以偏概全，见小遗大，学术就注定要丧失自己应有的精神境界，在由无数具体事实堆积而成的汪洋大海中迷失方向。一旦如此，其着力逾多，其离科学精神所追求的境界愈远。但另一方面，如果缺乏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缺乏对规范的必要尊重，脱离实际，游谈无根，空言“义理”，或以一偏之见为理，或以望文生义为理，或以自逞胸臆、杜撰“体系”为理，或以拾洋人、权威牙慧为理，学术也会丧失自己的精神境界，堕落为“玄学”。就学术与社会的关系而言，如果缺乏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将学术研究与服务现实简单对立，学术将不但会丧失发展的余地，而且也会逐渐丧失生存的空间。反之，如果将经世致用简单化、庸俗化，用应时之作取代理性而严谨的科学探索，学术就会堕落为“俗学”，也谈不上起码的尊严。

当代中国正面临着极其宝贵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当代中国学术也是如此。如何立基，何去何从，是每一个治学者都不能不面对的重大问题，岂可不深思而慎择之。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学者文库》付梓之际，聊草数言，权充书序。

高 翔

2010年4月于鼓楼西大街甲158号院

目 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探索与历史价值

——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	王 广(1)
“新帝国主义”的实质、根源及影响	李潇潇(16)
从“新中间道路”到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回归	
——简析德国社民党的《汉堡纲领》	李彩艳(24)
从赛义德的思想来源试析后马克思思潮的理论定位	郑 飞(31)
福柯哲学中的“权力”理论	袁华杰(41)
宽容克隆：真与善的双重呼唤	陈 静(62)
人力资本形成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个包含教育和健康的内生增长	
模型及其检验	杨建芳 龚六堂 张庆华(68)
我国能源产业发展的瓶颈及其对策	王宏宇(89)
经济实力支撑人民币国际化	张 征(98)
公益诉讼初探	刘 鹏(107)
回顾中国刑事诉讼中律师权利及其保障	郭 烨(125)
知青苦难与乡村城市间关系研究	刘亚秋(145)
酒神式的忠诚还是基督式的拯救	
——尼采眼中的瓦格纳	何兰芳(169)
西汉二千石秩级的演变	周 群(189)
晋文化对《诗经·唐风》创作的影响	杨 阳(205)
“五四”后十年间逃婚女性的社会生存环境	雷家琼(224)
试论“共变法”及其在当代史学研究中的价值	晁天义(241)
战争的讨价还价理论：探索战争的理性主义解释	焦 兵(259)

欧洲认同的形成

- 一个新制度主义的解释 范勇鹏(278)
话语权与文化外交 胡荣荣(302)
语言本位观、学术创新与民族品牌意识 宋晖(312)
秀水市场导购语言的顺应性实证研究 周悦(331)
论虚假新闻的侵权责任 冯建华(355)

舆论监督给隐性采访营造了什么样的空间

- 隐性采访能够成立的条件论证 聂双季为民(385)

当精英话语遭遇草根涂鸦

- 网络恶搞电影的传播 许航(404)
《纽约时报》(1997、2007)涉华报道比较研究 王建峰(416)
美国四年制大学低毕业率的原因 褚国飞(45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 理论探索与历史价值

——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

王 广

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走过了一段昂扬奋起的不平凡历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乘长风破万里浪的胜慨雄姿谱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最为辉煌灿烂的篇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以更加磅礴的发展态势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行了精辟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蕴涵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深邃的民族文化智慧和对当代中国国情的深切体认，构成了一种崭新的文化样态，它在最高的层面上深刻地寄寓着中华民族的发展智慧，标示着中华民族百余年来在追寻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社会和谐这一伟大梦想的道路上，披荆斩棘、艰辛探索而形成的崇高文化成果。

^①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1 页。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总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总的理论概括，以其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清晰洞察与深刻把握而构成一种崭新的文化样态。这一新的文化样态的择出，不是主观意志驱使下的偶然，而是充满了历史的必然性，走过了一段艰苦备尝、风云激荡的历史行程。享其实者怀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今天我们回首百年，梳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逐步指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胜利，并最终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历程，决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也不是简单地重述这段历史，而是为了穿透历史的风云变幻，系统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寻觅、探索、创造并在中国大地上扎根生长的历史必然因素，深刻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一种崭新文化样态的历史积淀和丰厚景观。

（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与革命道路的探索

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客观规律，论证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指明了实现无产阶级与全人类解放的理想目标和现实道路，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划时代的根本变革，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然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坚船利炮、亡国灭种的威胁驱散了天朝上国的迷梦，无数仁人志士开始了苦心寻找救亡图强道路的历程。但是，包括康有为、梁启超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孙中山先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内的各种探索，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中国人民仍在黑暗中痛苦地摸索。

延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改造社会的各种思潮更加复杂，风起云涌，纷纭多变，让人有目不暇接之感。大体说来，当时中国主要有以下几种思潮：（1）信奉三民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其中又可以分为孙中山、廖仲恺为代表的左翼，和戴季陶、胡汉民为代表的右翼；（2）信奉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以梁启超、张东荪等人为代表；（3）无政府主义，主张一切财产归公，废除一切政府机构；（4）合作主义，以复旦大学部分教员和学生组织的“平民学社”为代表，主张通过合作社和平改造社会；

(5) 新村主义，以周作人为代表，主张另辟一块小天地，建立没有压迫剥削、人人平等幸福的新社会；(6) 托尔斯泰泛劳动主义，强调自劳而食，人人参加劳动；(7) 工读主义或工学主义，主张劳心与劳力、工与读相结合；(8) 马克思主义，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为代表。^① 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只是当时各种社会思潮中的一家，而且最初还不是占主流的一家。梁启超就认为，马克思的学说有“谬误”，“其目的皆在现在，而未尝有所谓未来者存也”，并称马克思的学说“架空理想”，“足以煽下流”。^②

然而，真理的光辉无法长久掩盖。通过在实践中的多方比较，人们逐渐发现，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翻军阀统治和国外资本主义的压迫，中国的独立富强才能实现。除此以外的其他道路都是空想，根本无法实现。这种声音逐渐地成了社会的主流和强音，获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晨报》1921年7月2—6日发表题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争论问题》的文章，认为中国要发展实业，推翻军阀统治和外国压迫，就必须实行社会主义，而“资本主义不能实行于今日中国”。《新共和》第1卷第2号发表《贫乏问题的原因及其解决方案》一文，其中明确写道：“据现在大家公认的道理，代资本主义而起的当然是社会主义。我想：有理性、有良心的人，决不至反对社会主义！我们中国除非那些闭眼瞎说，不晓得世界大势的顽固党，也决没有胡乱反对社会主义的！”^③ 这些论述也许还没有达到透彻、严谨、科学的理论化高度，但它们真切地反映了人民心底的声音，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接纳与信奉。以李大钊、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则抱着严肃认真的态度，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展开了深刻的思考。毛泽东明确指出：“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④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在最初向往现代化时曾经尝试走过资产

^① 参见陈汉楚编著《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版，第99—101页。

^② 《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五册，第79、86页。

^③ 转引自陈汉楚编著《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第102—103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阶级（改良或革命）道路，但历史无情地告诉人们，这条道路走不通。要实现中国自立、自强，必须改弦更张，另觅新路。这里必须反对那种把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道路的真实历史说成简单地向西方学习、从而故意把历史搅乱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越是望向历史深处，我们就越是坚定。是的，我们要毫不游移地支持那些人类共同的价值。我们支持进步、民主、自由、人权，支持中国走向现代文明。我们可曾忆起，一百多年前，先贤们发现故步自封于本国文化已不足以救亡图存，因此埋藏了心中痛苦，远渡重洋，以寻求国家振兴之道？因此西风东渐，建兵工厂以御外侮，建学校以期未来，建报馆以开民智，因此德先生、赛先生给这个古老的国家带来了复兴之光。在这漫长历史的此端，我们可曾想过这个国家的希望从何而来？我们可曾想过，如何延续这希望，以不误国家和人民的前程？”这段话充满矫情地引领我们回顾起“一百多年前，先贤们……寻求国家振兴之道”的感人故事，并且以一个蹩脚的历史学家的口吻貌似深沉地引导我们追问：“在这漫长历史的此端，我们可曾想过这个国家的希望从何而来？我们可曾想过，如何延续这希望，以不误国家和人民的前程？”它的答案是明显的：希望来自于普世价值，只有认同普世价值、努力汇入人类文明的大道，才“不误国家和人民的前程”。这种观点，对中国人民向西方寻求真理屡求屡败，总是“先生欺负学生”的近代史极尽歪曲之能事，对西方发达国家矮化中国、唱衰中国、妄图将中国变为永久的利润殖民地的现实则如同将头埋入沙堆中的鸵鸟般视而不见。说穿了，如此写作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淡化、幻化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历史，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引向所谓的普世价值。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终确立奠定了最初的思想基础，那么，它在此后的发展历程也不是一帆风顺、顺势而成的问题。它还面临着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重大问题。

不可否认，中国共产党在立党之初，对这一问题还没有达到理论自觉的高度，往往依赖于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过度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而忽略了中国具体国情与俄国、西欧的巨大差异。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即遵照十月革命成功经验，制定了在大城市武装暴

动，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当时党内许多同志都认为，只要武装控制了大城市，就可以顺利地取得革命胜利，实现全国解放。具体说来，在中国共产党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之前，一直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而尚未被党内大多数同志自觉意识到。其中，一种是从书本出发，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以为靠照抄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词句就可以实现中国革命胜利的教条主义；另一种是轻视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从狭隘经验出发，满足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的经验主义。这两种错误倾向，一个是脱离了中国国情与革命具体实际，一个是忽略了科学理论的思想指导，其实质是一致的，就是割裂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忽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忽视了这一问题，就意味着中国革命难以找到正确的方向道路，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存亡，影响到中国革命的兴衰成败。正是在这样一个重大历史关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关注的目光和思考的中心，投注到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寻找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问题上。“八七会议”前后，毛泽东提出了“上山”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的主张。经过长期艰苦探索，历经无数奋斗牺牲，中国共产党人才领导中国人民开创了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从而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取得了革命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归结起来，在上述奋斗、探索、调查、钻研、总结、提升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实际上主要在解决两大历史任务。其一，是在思想理论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认识中国革命的本质规律，形成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正确道路的科学理论；其二，是在实践运动上，探索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方向道路，并据以采取正确的战略决策和重大方针，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

新中国成立之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领导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横亘在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

对这段历史，邓小平曾经总结说：“我们建国三十九年，头八年好，

后十年也好，当中那些年受‘左’的干扰，情况不大好。”^①在此发展过程中，发展得好，其根本原因就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发展得不好，出现“左”的倾向和严重干扰，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或者照搬苏联模式，脱离中国具体实际，或者生搬硬套经典作家的论述，无视中国国情。也就是说，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努力，重新陷入教条主义或者狭隘经验主义的窠臼，割裂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联系。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10年中，虽然遭到过严重挫折，经济社会建设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也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实践，总结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推动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过程。1957年春，毛泽东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继而，他又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要求。1958年，毛泽东又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些正确思想都深刻地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真理光辉，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提出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总路线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寻找社会主义建设正确道路的良好愿望，但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和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这一道路理论充溢着主观主义、脱离实际的色彩。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作用的因素逐渐渗入毛泽东等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领导工作中，以致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试验，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脱离了中国具体国情。

在领导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错误的过程中，以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又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和有益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其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0页。

中，毛泽东提出了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强调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和做好综合平衡，主张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等观点。周恩来提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刘少奇提出了许多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社会主义社会要有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等观点。朱德提出了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邓小平提出了关于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等观点。陈云提出了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定计划必须做好物资、财政、信贷平衡等观点。邓子恢等提出了农业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这些思想，凝结着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宝贵的工作经验，迄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正因如此，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浮出与总结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探索与胜利，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展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概括提供了思想地平和实践奠基。然而，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折，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到初步较为系统地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仍然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辛的探索过程。

改革开放之初，在邓小平主持下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系统地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概括为十条基本经验。其一，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其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

化的目标。其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们的任务是要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其四，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其五，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其六，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其七，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其八，必须加强现代化的国防建设。国防建设要同国家的经济建设相适应。其九，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维护世界和平。其十，必须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党的各级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① 这十条基本经验，从本质上说，都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可宝贵的理论资源。

在此基础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更深层次上展开了对具有中国特点、中国规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把这一时期的基本经验用高度凝练的语言概括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一论断，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破了题。邓小平强调，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提出和使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概念。

其后，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日益紧密地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日臻清晰。党的十三大作出了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论断，分析了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和主要矛盾，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①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39—844页。